

抗戰時期中共對土匪、會道門的策略

◎ 梁家貴

土匪、會道門是影響中共創建、發展抗日根據地的兩大重要社會問題。抗戰時期，中共從各地具體情況出發並結合不同時期的政治、軍事需要，採取了積極、穩妥、靈活的策略，較成功地解決了這兩大社會問題。本文以山東抗日根據地為主要研究對象，嘗試對中共有關策略產生的背景、形成過程、具體操作方法等方面作一論述。

本文涉及到的「土匪」，就是指超越法律範圍進行活動而又無明確政治目的，並且以搶劫、勒贖為生的人。土匪是1949年前中國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它不僅人數眾多，分布面廣，還擁有自己的武裝和根據地，甚至能左右當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從而形成「官匪分治」的格局。「會道門」是一種從事特殊宗教、社會或政治活動的，具有秘密宗旨和禮儀的，與政府抗衡的秘密團體。在1949年前的中國，所指的就是一些異端教派如黃天道（亦稱黃天教）、先天道（亦稱先天教）等（此類組織主要頌經拜神、製造和傳播迷信邪說，迷信色彩極為濃厚）和會門組織如哥老會、紅槍會、大刀會等等（此類偏重吞符唸咒，練功習武，據地自保），也就是統治者所說的「邪教」¹。

自近代以來，中國的土匪和會道門的活動一直是密切相連的。到了民國時期，它們的關係更加密切，已呈現錯綜複雜、難解難分的局面²，對中國政治、社會產生著日益重大的影響。基於這個原因，本文將二者視為一個整體予以研究。

史料顯示，民國時期，東北的馬賊、閩浙兩廣地區的海盜、太湖運河地區的鹽梟以及蘇豫皖、湘鄂贛、西北諸地區的土匪均以驍悍、善戰而在全國具有重要影響。保守估計，1930年全國土匪人數為2,000萬左右³。山東是全國土匪問題最為嚴重的省份之一。據統計，1918年，山東約30個州縣曾擁有土匪三萬多名，步馬槍約2.3萬枝，自來得槍3,000餘枝，他種手槍2,800餘枝⁴。而魯西東昌一帶就曾擁有「土匪一萬餘人，匪首300餘人」⁵。到1930年，山東境內的土匪人數超過20萬人⁶。山東土匪都是有武裝、有組織的，大的成千累萬，具有較強的戰鬥力（如劉桂棠部號稱「黑旗軍」，曾流竄整個華北）。1921年11月，北洋陸軍一營剿匪官軍在曹州劉莊便被擊敗⁷。至於發生於1923年5月的臨城劫車案更是震驚中外的大事。民國時期，中國的會道門勢力也極為強大。以當時山東的會道門為例，該省會道門有的影響力遍及全國，如一貫道；有的在華北地區產生影響，如八卦教、皈一道、九宮道、聖賢道以及以紅槍會為中心的各種槍會；至於省內的會道門組織更是不勝枚舉，計有150餘種，據已知道的會道門就有：新民會（不同於漢奸新民會）、復興會、保皇黨、聖人道、斥候隊、黃天道、五道會、九宮道、萬字會、先天道、黑旗會、紅旗會、黃旗會、藍旗會、白旗會、青旗

會、皇天教、一貫道、八卦教、戰壇會、道德會、紅槍會、無極道、九宮會、同心會、快道萬仙會、萬國道德會、猴子會、大刀會、金鐘罩、大地壇、小地壇、皈一道、黃中會、小刀子會、孫臏大師會、眼光會、清真會（婦女佔多數）、西乾會、金丹會、青年會、老年會、金錢會、中央道、聖賢道（又名一柱香、無形無像道）、秘密教等五十幾種⁸。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日軍大舉南侵，華北一些省區迅速淪陷。國民黨軍隊的迅速後撤致使一些地區陷入無政府狀態，千百萬百姓彷徨無主，眾多的雜色武裝應運而生，如處於山東抗戰前沿的魯北（即冀魯邊）之甯津、慶雲、鹽山以及惠民一帶之樂陵、無棣、陽信、沾化、臨邑、德縣、商河、德平等縣，「處於戰爭的混亂狀況，土匪也趨機而起」；魯西、魯西北地區，「土匪乘機蜂起」⁹。一些封建迷信團體如會道門等，依仗其在民間的巨大影響，也迅速活躍起來。據統計，山東、安徽等省的民間武裝至1938年已達100萬之多¹⁰。這各色各樣的民間武裝多屬土匪或會道門武裝，按對日態度可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屬於不堪忍受日本侵略軍的蹂躪而由群眾自發組織起來的抗日武裝，他們以各種形式打擊日軍，並同國民黨、共產黨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一類是被地主、豪紳組織、操縱的聯莊會、會道門武裝，其中有的已「變壞通敵，成為漢奸，同我們作對，破壞抗日」¹¹。1938年，山東萊蕪中央道道首張無海自稱「銅頭鐵羅漢」轉世，糾集徒眾萬餘人投降日軍，被編為第九旅，即是典型事例；最後一類是抱有各種不良企圖的人假借抗日名義組織起來的土匪武裝，他們常常打著抗日的旗號，到處橫行霸道，窮苦百姓過著「白天怕見人跑，夜間怕聽狗咬」的日子，提心吊膽，不得安寧¹²。有的土匪武裝公開叛敵，如土匪朱信齋，他本已被八路軍收編，但又於1938年8月率部叛變，一夜之間捕去中共黨員、幹部200多人，殺害近百人，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浮鵬山事件」。有位中共領導人在回憶錄中不無憂慮地寫到，這「眾多的土匪武裝多為敵、偽、頑主要的直接後備力量。他們與我們爭人、爭槍、爭地盤」¹³。民間雜色武裝的出現、發展，嚴重影響著中共勢力在廣大農村的存在乃至發展。

山東國民黨軍隊多為蔣系控制的原地方土匪武裝。繼韓復榘後的國民黨山東省主席沈鴻烈為代表的派系，絕大多數是在山東本土發展起來的，「帶有濃厚封建性的地方武裝，如魯中的秦啟榮、吳化文、厲文禮等部，魯南的申從周、王洪九等部，濱海的許樹聲、朱信齋等部，膠東的趙保原、秦晉康等部，清河的何思源、張景月等部，冀魯邊的劉景良、張子良等部，魯西的王金祥、齊子修等部，湖西的孫良誠、朱世勤等部」¹⁴。國民黨也刻意利用和操縱土匪、會道門以達到反共目的：國民黨山東省政府就積極利用土匪吳德勝、劉景良、朱世勤等部反共¹⁵；對於會道門，國民黨山東省黨部在制訂的反共計劃實施辦法中，明確提出了利用、操縱迷信團體的策略：一，利用民眾迷信心理，拉攏全省各地道門、幫會、基督教民之領袖份子，假借不倫不類之名義，先使入夥，使在不知不覺中為吾人效死；二，收買全省各地道門、幫會基督教民之頑固激烈份子，加以訓導，使在不知不覺中服從本黨指導為吾人效死；三，分別各項民眾迷信團體之性質，選派本黨中熟悉該團體內幕之幹練同志，假借該團體所需要崇拜之人物，如道門中之師傅、宮長、壇長、法師、道長……，詭稱由為該團體素昔認為之聖地到來渡世救人，如對道門則稱由昆侖、峨眉、瑤珈、靈鷲等地，以堅定其精神上崇拜尊敬信念……，民眾頭腦簡單，如此一行，則莫不為信仰之團體效命致死，而實際則為本黨效命致死；四，假借迷信方式，……，復將本黨訓民眾之方法秘密融化運用，使其自己雖入鈎而不自知；五，利用以上方式，假借各該團體崇拜人物訓示命令為號召，發起對中共之大規模暴動屠殺行為；六，在進行過程中，隨時運用其固有組織與反抗心理，使其不斷流血，俾其與中共結成百世不解之仇¹⁶。

日本侵略者也充分認識到會道門的重要作用，並專設有會道門工作部，有目的、有計劃地培植、利用漢奸會道門為其侵華反共服務：一是創造會道門，這些會門實際上是一種漢奸組織，如道德會、協和會、大同會、新生會等；二是進行改造會道門，把舊有的會門加上偽政治工作（派政工人員）使其質變名不變，如經敵改造了的安清道義會、一貫道、秘密教、提籃子會、硬拳道、黃沙會等；另外，日本侵略者曾花了極大力量，以「萬道歸一」的口號企圖統一會道門，如將紅會、一心天道龍華聖教會、一貫道等會道門組織成為「山東宗教聯合會」；1942年，京師普濟佛教會為適應東亞和平的需要，在日軍授意下改名為「未來和平宗教會」，不久在濟南組織分會並建立「山東保衛團」，協助日軍進攻中共的抗日根據地；三是利用會道門，這不同於改造，而是相互利用，這些會門更多，如鐵板道、皈一道、部分天主教，據統計有二十多種。日本侵略者利用會道門主要做下面工作：

（一）在淪陷區，以會道門形式組織群眾，提出所謂「保家防匪」的口號，阻止八路軍深入其佔領區活動，如在「治安區模範縣」山東嶧縣，日軍強迫當地農民參加紅槍會組織，每天晚上都要開講、練功夫，即使農忙季節也不例外，有時還脅迫他們去嶧南搶糧¹⁷。

（二）在邊緣區，則以發展會道門作為向抗日根據地封鎖或蠶食的先鋒隊。

（三）在抗日根據地，則利用會道門作特務活動線網之掩護；其次利用中共政策弱點（如負擔重、差務多、站崗放哨多等），組織群眾反抗政府，「掃蕩」時作內應，或武裝暴動，有的則長期埋伏¹⁸。

上述事實充分說明，土匪、會道門問題已對中共創建、發展抗日根據地構成了嚴重威脅。能否積極、穩妥地解決土匪、會道門問題並為抗日所用，成為中共能否順利創建、發展抗日根據地，乃至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關鍵。

二

早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為了團結和爭取一切抗日力量，中共對土匪、會道門以及與這些團體有關的地方武裝便廣泛開展了爭取教育工作。1935年底，中共及其主力部隊到達素以匪禍嚴重著稱的西北地區不久，便著手解決該區土匪、會道門問題。對於土匪問題，中共在艱苦、惡劣的武裝鬥爭中已積累了豐富經驗，井岡山時期王佐、袁文才武裝的改造便是典型事例。中共川陝根據地陝南特委將「神團」改造為游擊隊，也為中共解決會道門問題提供了成功的經驗¹⁹。1936年7月15日，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人民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發布了對哥老會等組織的宣言，號召他們和全國人民一起團結起來，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國的要求下聯合起來，結成親密的、兄弟的團結，共抱義氣，共赴國難」，「歡迎四路好漢弟兄都派代表來或親自與我們共同商討救國大計」²⁰。1936年8月，根據中共中央關於爭取哥老會的指示，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設立哥老會辦事處，成立了中華江湖抗日救國委員會籌備處，並於同年10月15日在陝西省志丹縣的馬頭山召開了全國哥老會代表會議，也就是「馬頭山開山堂」。抗戰全面爆發後，在中國共產黨的爭取、努力下，中國建立了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包括各黨派各界各族團結抗戰的局面，為爭取、改造土匪、會道門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和社會條件。中共山東省委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在敵後放手發動群眾，獨立自主地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戰略決策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的「每一個優秀共產黨員，應該脫下長衫到游擊隊去」的口號，制訂了團結、爭取一切武

裝力量，發動武裝起義的方針。鑒於山東的特殊省情，中共山東省委決定要選擇在韓復榘潰逃，而日軍尚未到達或立足未穩的時機發動武裝起義，因為如果起義過早，則可能遭到韓復榘的扼殺；起義過遲，日軍則深入侵佔，會增加發動起義的困難，而且地方反動勢力和土匪也會蜂擁而起，民間槍枝就會被攫取²¹。在此前後，中共山東省委即以各地黨組織領導成員為核心，以黨員、民先隊員、延安派來的紅軍幹部及平津流亡學生為骨幹，積極團結爭取各階層愛國人士、各地方勢力及土匪、會道門，不失時機地在全省各地發動了抗日武裝起義，初步開創了建立山東根據地的局面。

應該說，中共爭取土匪、會道門參加抗戰的決策並非一開始就為全體中共人士所接受。抗戰全面爆發後，王明從蘇聯回國。他片面誇大「統一戰線」的作用，堅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主張，反對積極發展人民抗日武裝。這對中共抗日武裝力量，特別是江南新四軍力量的發展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中共東南局書記項英深受王明思想的影響，曾多方限制部隊的發展，限制群眾運動，如拒絕批准新四軍二支隊收編土匪部隊²²。當然，這種錯誤思想還來自於其他方面。中共軍事領導人羅榮桓就曾在回憶錄中分析到：由於本身年輕，加上過去長期處於地下黨的地位，缺乏執政經驗，對政權的作用與認識不夠，因此在政權的領導上也出現了偏差，從而「障礙各種工作的開展」，如在爭取土匪、會道門工作上，突出表現為不敢發動他們，尤其是對於爭取反正過來的偽軍與收容編制起來的土匪，我們黨「對他們的黨政工作是異常微弱或者根本沒有」，因而「往往把他們擺到邊緣游擊區而獲得勒索搶掠的合法地位，這不能不造成我們在嚴重三角鬥爭相持的地帶上遭到失敗」²³。

中共對這種右傾機會主義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和鬥爭。1939年底、1940年初，中共中央、毛澤東兩次指示山東的黨要把發展武裝力量作為一切工作的中心，「山東那邊民槍極多，主要是缺少幹部和基幹力量」，因此，要「在山東全境大量發展軍隊」²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委劉少奇針對項英等人批評新四軍「招兵買馬」的言論，說：

「有馬不好嗎？為甚麼要反對？有人不用，有馬不騎，革命能成功嗎？」²⁵1942年3月中旬，劉少奇從新四軍回延安時，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委託，途經山東，代表中央幫助、指導山東工作。劉少奇傳達了毛澤東關於要在敵後放手發動群眾，擴大人民武裝，獨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總方針。中共山東分局根據劉少奇的指示，改變抗戰初期不敢放手發動人民抗日武裝的做法，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積極壯大人民武裝力量。通過對地方武裝，尤其是土匪、會道門的爭取，中共在山東的力量得到極大的發展²⁶。

此外，中共也極力改變黨內輕視爭取會道門、土匪武裝參加抗日工作的思想。最初，中共黨內很多人認為會道門落後，有「迷信儀式」，土匪行動散漫，破壞性較大，因此，不願對他們作耐心的爭取教育工作。為此，中共決定對根據地的全體黨員幹部普遍進行宣傳教育工作。1938年1月16日，《新華日報》發表了〈保衛河南〉的社論和〈怎樣處理地方武裝〉的文章，認為正當「廣泛開展游擊戰爭，準備迎接中原會戰的時候，正確地處理地方武裝，如紅槍會、聯莊會、民團、土匪等武裝力量，是有特殊的意義和重要性的」。彭真在〈論冀魯豫紅槍會工作〉一文中指出，紅槍會、大刀會等秘密會社，「不但包括著最大多數的農民，而且擁有極大數量的新式武裝，這是一支極雄大的群眾抗日武裝力量。但如果不善於去團結他們，就會使抗日力量受到不必要的損失」；關於如何對待會道門的迷信儀式和習慣諸問題，他指出²⁷：

一切在會門中工作的同志，對於他們迷信的儀式和習慣，必須嚴格審慎的遵守，須知今天我們在會門中工作的中心問題，是紅槍會能否抗日和能否爭取他們進入抗日戰爭統一戰線。應把迷信的問題放在次要地位，同時還要了解，我們固然不提倡迷信，但如果違反他們的習俗，是會惹起他們的反對，而被日寇和漢奸利用來反對我們。

與此同時，彭雪楓也撰文強調爭取綠林武裝（即土匪和會門武裝）的重要性，指出：「對於『綠林武裝』，基本上是由『政府的力量』爭取他們走到抗日戰線上來，在政治上對之宣傳教育，在鬥爭中激發他們的民族意識」；「對於『會門武裝』，對他們應有正確的基本認識：（一）他們是比較原始的反貪污反土匪的民間自衛武力，（二）他們的潛勢力在民間廣而且深，（三）戰鬥精神及戰鬥經驗都相當豐富。倘若對他們誘導有方，在軍事政治方面武裝了他們的頭腦和武裝了他們的手腳，我們相信在從前反抗軍閥壓迫的時代，他們能夠大量消滅軍閥的數萬大兵，我們更相信今天他們也能夠嚴重打擊日寇的進攻。」²⁸此外，八路軍副總司令員彭德懷也發表文章和談話，號召八路軍幹部必須爭取敵佔區的土匪，通過耐心細緻的組織工作，把土匪武裝改造成為正規游擊隊²⁹。這些文章和談話為中共各地方組織處理本地區的土匪、會道門問題指明了方向，從而將對會道門和土匪武裝的爭取工作統一到中共的方針政策上來了。

1938年1月，中共中央在給中共山東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確制訂了山東省堅持抗戰的原則，「即使山東完全變為日寇佔領區域，還能使我們的黨堅持在山東，發動群眾，組織游擊戰爭，保存黨的力量，堅持的與日寇進行長期的鬥爭」。為此，中共中央特別把土匪、會道門問題列為首要處理的工作，指出³⁰：

山東為土匪最多的地區，必須對土匪有正確的政策。我們對土匪的總的方針，應當是爭取他們抗日。當土匪還是抗日時，我們不應去削弱或瓦解他們的部隊，應當幫助他們的發展，鞏固他們的部隊，並逐漸改善與群眾的關係，與他們爭取共同行動去反對日寇。當土匪為日寇所利用時，我們也不應當去積極反對他們，而應當使他們中立，即是他們一方面去敷衍日寇，一面與我們保持善意的中立。

按著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山東分局（中共山東省委於1938年5月擴大為蘇魯豫皖邊區省委，1938年底改為山東分局）調整了原有的有關政策，並結合本地區的特殊情況探索出一套針對本地區會道門、土匪的切實可行的政策：「對於各種封建迷信團體，如會門、教門等，只要他們有抗戰赤忱與抗戰表現，而不是為了反對抗戰，或被敵人利誘實行反動倒退的活動，我亦應與之聯絡，如過去有誤會，今後應設法解決疏通，即使為敵利用時，我仍應從各方面一致去爭取，從事實上使其不再懼我，並注意對其下層群眾的爭取和團結，推動下層的進步，以使之不被少數上層落後份子愚弄出賣，擾害抗戰及群眾利益」，而「對於土匪，應設法勸導其散夥，參加抗戰，參加農村生活，必要時政府應撥款予以救濟及安插生活。但對怙惡不悛的股匪，應堅決予以剿滅，以安定根據地的民主秩序」³¹。這便給中共成功解決山東土匪、會道門問題並動員組織他們參加抗戰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保障。

1942年後，中共領導的敵後抗日鬥爭進入了最艱難的時期。一批抗日意志不堅、見風使舵的土匪、會道門紛紛投靠日本。鑒於此，中共決定取締根據地內的會道門組織。晉冀魯豫根據地為抗戰時期中共最大的根據地，也是其武裝力量對日作戰的最主要區域，因此，1943年3月該地區頒布的取締會道門政策頗具代表性。該政策宣布嚴加取締一切受敵利用之秘密結社，規定：（1）凡本地區內違抗抗日利益之一切非法秘密落後迷信組織以算卦、孔子道還鄉道

等，或其變相化名之組織，一律取締，並宣布解散。（2）受敵利用之各種組織會門造謠惑眾，圖謀不軌，破壞抗日秩序，執迷不悟者，凡經查獲，均按漢奸處置。（3）假借會道門擺壇設祭，勒索人民財產金鈔者，均以詐財處置。（4）曾原在淪陷區（平津太原等地）受漢奸所迫組織之佛教、道教，現不違反抗日利益，積極參加抗日建設工作者，得向抗日政府請求登記，悔過自新，不得再行活動。（5）凡參加會門道門及其他一切非法秘密團體者，應即退出，並向政府聲明登記，以免受漢奸利用。隨後，中共在其根據地內大力打擊漢奸會道門，如晉冀魯豫邊區便破獲、瓦解了世界普濟佛教會、一貫道、萬國道德會、大刀會、紅槍會、九宮道、華北道德總會、混元門等組織³²。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矛盾日益激化。隨著中共領導的根據地進一步擴大，會道門問題再次尖銳起來。為此，中共毅然採取堅決取締的措施，並於50年代發起了一場舉國上下、大張旗鼓的打擊會道門的專項鬥爭，一定時期內鏟除了這種組織。由於中共已積聚了充分的力量，加之其根本任務已由抗日救國轉變為推翻國民黨統治，故這一時期的土匪問題無論與國民黨、豪紳地主有無關係，如其存在，均視為是同中共利益相對立的，在教育無效後，自然遭到鎮壓。

三

抗戰時期，中共在處理根據地的土匪、會道門及其他地方武裝的過程中，依據制訂的有關策略，視不同情況、不同對象，區別對待，大致有以下幾種操作方法：

（一）對人民群眾為了抵禦日偽軍、土匪騷擾，保護生命財產自發組織起來的民間武裝組織，中共採取積極支援、引導的方針。抗戰爆發後，全國各地人民紛紛組織自衛團體，並在抗敵鬥爭中發揮了巨大威力。江南丹陽游擊隊和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就是在中共的支援、引導下，以江南淪陷後各地為防匪抗敵而組織的自衛團為基礎組成。山東安丘黃石坡自衛團，「用原始武器，抗擊著上千的敵偽，堅持了五個鐘頭，最後彈藥斷絕，才英勇突圍而出，創造了群眾浴血奮戰，保衛家鄉的戰鬥範例，給敵偽以嚴重的打擊」³³。為支援引導這種民間自衛武裝組織，中共制訂了《人民抗日自衛團組織條例》，鼓勵「凡年在16歲以上、45歲以下無廢疾者均應參加自衛團（婦女以志願為原則，其工作無基礎之地區男子亦以志願為原則）以進行抗日游擊戰爭，或配合抗日主力軍作戰」³⁴。此後，中共山東分局、山東軍區聯合發出《為發動人民武裝保衛家鄉告同胞書》，號召人民群眾自發組織起來抗擊日寇侵略。據不完全統計，到1942年，山東民兵已發展到17萬人，自衛團發展到82萬人；在1939—42年，民兵、自衛團同日偽軍作戰達18,093次，斃傷和俘獲日偽軍共9,000餘人³⁵。

（二）對於根據地的會道門，中共派幹部深入其內部進行爭取教育工作。1938年，毛澤東、洛甫等在致彭德懷、劉伯承、徐向前、鄧小平的電文中指出，「對於會門、土匪採取慎重的態度去應付，依據具體可能條件打進去改造他們」³⁶。1939年，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在視察新四軍工作時，對幹部提出，要「爭取青幫、大刀會的群眾，我們應研究這些組織，進行政治工作，爭取他們」³⁷。劉少奇也曾撰文指出，不論紅槍會、聯莊會，「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反對苛捐雜稅及土匪軍隊的騷擾，是單純的武裝組織，他們對於一切問題都是從本身利益出發，誰去騷擾掠奪他們，他們就反對誰，解決誰」，「他們在政治立場上是中立的」，因此，要動員、教育他們，提高他們的民族意識，領導他們對日作戰³⁸。這便給各地根據地處理土匪、會道門提供了基本的指導思想。泰西（即泰安縣津浦路西地區）是山東省

內紅槍會最多的地區之一。中共在處理這一地區的紅槍會時，深深地意識到，多數紅槍會頭頭雖被地主操縱，但其成員多為勞動人民，他們目睹日軍燒殺姦淫的侵略暴行，有抗敵保家的要求；加上一部分地主有民族感、愛國心，也有聯合抗日的可能。因此，中共採取了「分化、團結、教育的方針，組織他們對敵鬥爭」。泰西特委會指派政治部民運科科長張伯源專門負責做紅槍會的工作，最大程度地團結了紅槍會的群眾，「他們支援抗戰，聽從我們的指揮。在我們同牛希文部作戰中有2,000多紅槍會群眾同我們一起戰鬥」，「我們對紅槍會的工作是成功的」³⁹。1940年6月，中共晉冀魯豫邊區黨委派人利用與會首楊貫一的親戚關係打入天門會，成功地利用、爭取了天門會武裝⁴⁰。

（三）對於為敵特偽化所組織的會道門，必須盡力爭取。抗戰時期，日寇利用一些不滿中共政策的土匪、封建勢力，利用會道門在中國農村中廣泛巨大的影響與群眾的迷信落後心理，同時也抓住中共初期在邊沿地區政策上的失誤，操縱在各地普遍存在的會道門，從而造成了群眾與中共的對立。對於這種為地主所掌握、所操縱，又為日寇所利用的帶有群眾性的組織，中共沒有簡單採取「打」的方法，而是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根據不同的原因、對象，提出了相應的對策⁴¹：

原則上應分化瓦解，爭取其群眾，團結一切可能同我們合作的中間力量，獨立上層首腦份子，通過群眾路線鎮壓個別漢奸頭子，揭發其作惡的事實；對我如果在執行政策時發生錯誤而造成群眾與我對立的地區，我必須解釋，收回影響；對少數為漢奸所操縱，反我最積極的會門，就是要予以軍事鎮壓時，也必須異常慎重，這種鎮壓只是為了打擊漢奸活動與爭取會門群眾的目的，決不能採取狹隘的報復觀念而脫離群眾，獨立自己，而且我們的部隊紀律必須嚴明，秋毫無犯，才能爭取廣大群眾團結在我們的周圍。

新四軍挺進江南後，日軍曾企圖利用江南普遍存在的大刀會打擊新四軍。為此，新四軍對大刀會的迷信採取不干涉的辦法，著重從政治上團結爭取他們，結果大刀會也漸漸走上抗戰的道路⁴²。1938年5月11日，河北南宮六離會趁八路軍主力攻打威縣之機殺害過路的八路軍官兵，並扣押了前往交涉的八路軍談判代表。八路軍129師副師長徐向前決定，「一、為開展工作爭取群眾，決以主力集結南宮附近。在部隊中動員教育後，即向六離會活動地區進行武裝宣傳；二、分化瓦解其組織，爭取群眾，進行民族教育，揭破漢奸陰謀；三、對為首者鎮壓之；四、散發告人民書，張貼布告，使群眾勿生疑恐慌」。5月12日，朱德、彭德懷指示徐向前，「必須聯繫檢查地方黨及我們軍隊在該區的統一戰線工作；同時對該區偽組織內部，應靈活進行爭取、分化，孤立其領袖的工作，並須自己以抗日行動與廣泛的統一戰線影響之，決非簡單鎮壓的辦法」⁴³。根據有關指示，八路軍在展開強大政治攻勢的同時，對六離會進行反擊，使其徹底覆滅⁴⁴。

（四）對於積極反共的土匪武裝，會道門，堅決予以打擊和消滅。1938年下半年，中共山東「挺縱」四支隊、五支隊鏟除了對抗日危害極大的反動土匪武裝劉彥臣、孫仲文、孫唐臣等，使邊區部隊和根據地迅速擴大。山東泰西昆山縣徐樓村、耿樓村紅槍會頭目王明煌、徐四等惟恐中共及八路軍宣傳抗日主張會不利他們擴大組織，因此蓄意中傷中共的抗日主張，阻礙中共的組織化，並逮捕、屠殺共產黨員及進步人士，進攻抗日武裝。終於，中共在1941年12月23日進行反擊，斃傷王明煌、徐四等400多人，俘獲300多人⁴⁵。又如活動於蘇魯交界的山東巨匪劉黑七（劉桂棠），他一面投靠日本侵略者，充當侵華日軍的「皇協軍前進總司令」、「和平救國軍」第10軍第3師師長，一面又做著國民黨蘇魯戰區「新編36師」師長，幹

著屠殺中共幹部及進步人士、殘害人民群眾、進攻八路軍的罪惡勾當。八路軍經過充分準備，於1943年11月發起反擊，將其擊斃⁴⁶。經過多次平息、打擊土匪、會道門的暴亂，中共根據地得以擴大和鞏固。

四

抗戰時期，中共在根據地採取的爭取會道門參加抗戰的政策，是基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並在中共關於人民戰爭和抗日持久戰的方針指導下制訂的。對會道門採取團結和爭取、不干涉其封建迷信的策略；對土匪則爭取他們參加抗戰，並逐漸改變其性質，使他們積極抗日、協同作戰，最終納入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當然，中共改造、收編土匪、會道門武裝並非一帆風順的，因為有些職業性土匪過慣了散漫放蕩的生活，難以忍受部隊嚴格的組織紀律，雖一時接受中共的改編，但匪性不改，有的仍在地方上幹著「打農民保土豪」的勾當，有的調到前方去就動搖、逃跑，給中共的事業造重大損失；會道門帶有濃厚的封建、落後性質，「私人利害觀念尚未克服，因之動作極不一致，配合也不密切，甚至在日寇漢奸的陰謀挑撥下，相互猜忌，相互爭奪，引起了一些愚蠢的行為，減低了抗戰的力量」⁴⁷，抗戰時期各種幫會、迷信團體遭日本侵略者利用，被作為吞併本國的馴服工具、用來麻醉本國人民，甚至協助日軍進攻抗日根據地、殘害同胞，即是突出的體現。但是，整個抗戰時期，一方面由於中共採取了正確的策略，另一方面因為抗戰本身是一場保衛家鄉、挽救民族危亡的民族自衛戰爭，稍有國家民族觀念的人都不願當亡國奴，同時，日本侵略軍蔑視中國民眾及其對土匪、會道門的粗暴行為也使很多土匪、會道門心生怨恨，「敵人壓迫，經濟負擔太重，偽軍的摧殘，『配給制度』使會門與原來保家願望相反，……在敵佔區，有些會門感到沒有出路」⁴⁸，因此，土匪、會道門參加抗戰的情況相當普遍。一位外國記者在中共領導的根據地作了詳細調查後，寫道⁴⁹：

在抗日戰爭結束的時候，把共產黨控制的地區與全國其他地區作一比較，結果會令人大吃一驚。在政府控制的地區，掠奪性的土匪活動在戰爭期間實際上是有增無減。……另一方面，在共產黨統治的地區，不論是共產黨的報導還是路過的旅行者的報導，從1944年開始，已經根本不再提到土匪活動。

這應該能視為中共對土匪、會道門策略成功與否的一個佐證。

會道門問題的成功解決具有重要、深遠的意義。它不僅使中共創建抗日根據地的工作得以順利開展，極大地支援了抗戰，同時，也為後來中共處理、解決此類問題積累了必要的經驗。

註釋

- 1 蔡少卿：《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1-5；邵雍：《中國會道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1。
- 2 蔡少卿編：《民國時期的土匪》（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頁8-11。
- 3 朱新繁：《中國農村經濟關係及其特質》（上海：上海出版局，1931）。
- 4 參見陸軍部檔（北十一）1198。
- 5 《時報》，1918年7月17日。

- 6；49 貝思飛 (Phil Billingsley) 著，徐有威等譯：《民國時期的土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39；341。
- 7 陸軍部檔（北十一）1201。
- 8；15；18；48 山東省檔案館、山東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頁134；139；135；137。
- 9 〈中共山東省委關於目前形勢與工做方針的報告〉，載中共山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山東抗日根據地》（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頁21-25。
- 10；47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862；550-56。
- 11；39 段君毅：〈泰西抗日根據地的開闢〉，載註9書，頁288；288-89。
- 12 〈抗日模範村——淵子崖〉，載註9書，頁433。
- 13；21 黎玉：〈艱巨而偉大的山東抗日鬥爭〉，載註9書，頁212；227、214。
- 14 轉引孫祚民編：《山東通史》（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頁783。
- 16 《解放日報》，1943年7月27日。
- 17 《大眾日報》，1942年8月28日。
- 19 參見林超編：《川陝革命根據地歷史長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頁32-34。
- 20 〈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哥老會宣言〉，《鬥爭》，第105期（1936年7月）。
- 22；25 鄧子恢：〈新四軍的發展壯大與兩條路線的鬥爭〉，《星火燎原》，第六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頁383；384。
- 23 羅榮桓：〈堅持我們的邊沿游擊區〉，《鬥爭生活》，第16期（1942年8月）。
- 24 轉引趙延慶：〈抗日戰爭中山東戰略區的地位和作用〉，載全國中共黨史研究會編：《抗日民主根據地與敵後游擊戰爭》（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頁170。
- 26 蕭華：〈難忘的四個月〉，《紅旗》，1981年15期。
- 27 《群眾》，第1卷第22期，頁377-78。轉引自《河南史志資料》（6），頁14-16。
- 28 《新華日報》，1938年6月14日。
- 29 轉引註1，頁361。
- 30 〈中共中央給山東省委的指示信〉，載註9書，頁26-29。
- 31 中共山東分局：〈關於抗戰四年中共工作總結與今後任務的決議〉，載註9書，頁117-18。
- 32 《解放日報》，1942年3月30日。
- 33 《大眾日報》，1944年5月19日。
- 34 載註9書，頁69。
- 35 田克深、王兆良：《光輝的百年歷程》（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4），頁304-305。
- 36 《毛澤東軍事文集》（二）（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共文獻出版社，1993），頁218。
- 37 周恩來：〈目前形勢和新四軍的任務〉，載《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08。
- 38 劉少奇：〈堅持華北抗戰中的武裝部隊〉，《解放》，第43、44期，1938年7月1日。
- 40 《燎原》，第六期（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147。
- 41 中共山東分局、山東軍區政治部：〈關於堅持邊沿對敵鬥爭策略的指示〉，載註9書，頁171-72。

- 42 《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頁438-40、480。
- 43 李達：《抗日戰爭中的八路軍一二九師》（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111-12。
- 44 參見陳再道：《陳再道回憶錄》（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頁373；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民國會門武裝》（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113。
- 45 王顯柱等：〈平息徐樓紅槍會暴亂〉，載《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選編》，第2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0），頁439-42。
- 46 〈巨匪劉桂棠禍魯及滅亡〉，載山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山東史志資料》，第2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2），頁154-69。

梁家貴 1968年出生，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秘密社會史。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2年6月號總第七十一期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